

儒法庫事路線斗争史話

农村读物出版社

儒法军事路线斗争史话

吉林大学历史系《史话》编写组

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
农村版图书编选小组选编

儒法军事路线斗争史话
吉林大学历史系《史话》编写组

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75印张 72,000字

1976年1月第1版 197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01—140,000

书号 11168·16 定价 0.20元

前　　言

人类社会，自从有了私有财产和有了阶级以来，就开始了持续不断的战争。战争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最高形式，是政治斗争最集中最激烈的表现。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

我国自春秋战国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始终贯穿着儒法斗争。这个斗争既反映在政治上，也反映在军事上，所以军事问题是儒法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儒法两家在治军思想上，在战争观上，在备战问题上，在用将待兵问题上，在对外战争问题上，在战略战术问题上的对立和斗争都是十分尖锐的。因此，要彻底批判儒家的反动思想，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经验，必须研究儒法两条军事路线的对立和斗争。

法家是当时社会进步阶级和进步势力的政治代表。他们的军事思想和军事实践，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在历史上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有些法家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些珍贵的军事理论著作。但是，法家的军事理论和战争活动，都是为他们本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是有着一定的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的。法家进步的军事路线和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军事路线是有本质区别的。

资产阶级野心家林彪，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他以孔孟之道作为反动的思想武器，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动儒家的军事路线也就不可能没有联系。我们研究儒法军事路线斗争历史，深刻揭露儒家的军事思想的反动性，有助于对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批判，有助于深挖林彪反动思想的历史根源，有助于认清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这本史话，是我校历史系七二届部分工农兵学员，在教员帮助下编写的。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听取了工农兵群众的意见，得到了不少同志的帮助，在这里表示衷心感谢。由于我们的理论水平所限，史料看得不多，本书难免有错误和不当之处，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吉林大学历史系《史话》编写组

一九七五年六月

目 录

一	奖逃兵孔丘以礼治军 斩吴姬孙武演兵执法	1
二	行新法商鞅以战去战 开倒车孟柯欲罢三军	7
三	以逸待劳孙膑围魏救赵 疲于奔命庞涓兵败被擒	14
四	盗御玺吕嬃武装政变 战群雄秦皇统一中国	20
五	战成皋刘邦灭楚兴汉 败垓下霸王别姬自刎	25
六	篡军权韩信谋反被诛 平叛乱吕后建立功勋	29
七	“清君侧”吴王濞作乱 细柳营周亚夫整军	33
八	众儒生屈膝求和阻战 汉武帝挥兵点将抗敌	39
九	袁绍崇儒拒谏败官渡 曹操尊法纳谋定北方	44

十	诸葛亮以法治天下	
	关云长崇儒失荆州	50
十一	“闻鸡起舞”祖逖兴师北伐	
	“草木皆兵”苻坚大败淝水	56
十二	刘武周拥兵割据反唐	
	唐太宗率军统一全国	61
十三	徐敬业崇儒兴兵反女皇	
	武则天尊法挥师讨叛逆	66
十四	革弊政王安石整军经武	
	守旧制司马光妥协投降	72
十五	抗金兵岳飞征战沙场	
	当奸细秦桧卖国投敌	77
十六	建新军戚继光抗倭取胜	
	结死党贼严嵩卖国通敌	83
十七	收台湾郑成功大震国威	
	畏中华殖民者闻风丧胆	88
十八	雅克萨康熙抗敌卫国土	
	尼布楚中俄平等订条约	93
十九	林则徐虎门禁烟反侵略	
	道光帝屈膝卖国恐外洋	98
二十	李鸿章避战求和败甲午	
	严几道富国强兵斥洋务	104

—

奖逃兵孔丘以礼治军 斩吴姬孙武演兵执法

春秋末期，正是我国历史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变革的时代。当时，奴隶起义风起云涌，接连不断；新兴地主阶级向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夺权斗争日益激烈。在这种斗争形势的推动下，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和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儒家，在政治思想领域也展开了尖锐的斗争。政治路线的对立，必然引起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孔老二为了“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开历史倒车，极力鼓吹奴隶制那一套陈腐的军事制度，企图使它死灰复燃。“以礼治军”就是孔老二军事思想的核心，“孔丘奖逃兵”的故事，就是他这种“以礼治军”思想的一个典型事例。

据说，有一个鲁国人，跟着国君出去打仗。这个人贪生怕死，畏敌如虎，在三次战斗中，三次临阵而逃。照一般常理，这个人是应该治罪的。可是，孔老二听到这个消息，感到有点奇怪，就跑去问这个人：“你为什么要临阵逃跑呢？”这个逃兵回答说：“我家里有年迈的父亲，如果我死在刀枪之下，谁来养活他呢？我是怕不能尽孝、落个‘不孝之子’的名声，才逃跑的啊！”听完逃兵的自白，孔老二想：我周游列国，到处宣扬“以孝

悌为本”，但响应者却是寥寥无几，这个人虽说是个逃兵，但他逃跑是为了尽孝啊！这不就是“孝悌为本”的人吗！难得！难得！于是他赶紧跑到鲁国国君面前，把这个个人吹嘘了一番。就这样，这个可耻的逃兵非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时来运转，被“举而上之”，受到了重用。临阵逃跑，倒成了他官运亨通的阶梯。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军事是从属于政治、并为政治服务的。因此，用什么思想建设军队，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是关系到军队为哪个阶级、哪条政治路线服务的大问题。

孔老二把“周礼”做为军队建设的根本，说什么“如果军队用‘周礼’来治理，就会取得成功；如果军队离开了‘周礼’，打仗就必然失败”。他以“周礼”为带兵之道，胡说：善于用“周礼”来教育和训练奴隶七年，就可以用他们去打仗了。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他的学生子路，曾经按着“周礼”的一套规定去打仗，结果做了廉价的牺牲品。

子路名仲由，是孔老二的得意门徒，他仗着“好勇力”，会三五下武术，做过孔老二的保镖。他曾积极参预孔老二策划的“堕三都”阴谋，是镇压齐国新兴地主阶级力量的刽子手。后来，子路跑到卫国去当官。临走时，孔老二嘱咐他说：“仲由啊！卫国情况复杂，不好治理。但你只要能按‘周礼’办事，非礼勿听，非礼勿行，讲究礼、义，就能搞好。”子路回答说：“先生的话我全记住了，我一定按礼、义去做。”

那时候，新兴地主阶级纷纷向奴隶主贵族夺权。各个诸侯国不断发生武装政变的事情。卫国的蒉聩（音愧溃）发动政变，赶走了卫出公。当时子路正在外边，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恼

火。他认为这和“孔夫子”讲的那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说教，是水火不相容的。于是，子路急急忙忙赶回国都。他跑到城门口，遇上了孔老二的另一个门徒子羔。子羔对他说：“主公早就逃跑了，城门已经关上了，你还是回去吧，不要去自讨苦吃了！”子路听了，不以为然地说：“我既在卫国做官，卫国发生了事变，我怎么能不管？志士仁人，不能贪生怕死而损害了仁义”。子羔劝阻无效，只好走开。随后，子路便趁着外国使者进城的机会，跟着混进城去。子路看到蒉聩和孔悝站在一个台子上，他便凶神恶煞般地质问蒉聩：“你为什么要发动政变，做出这不仁不义的事情？赶快杀掉孔悝！不然，我就放火烧掉这个台子！”蒉聩见子路如此狂妄，就派两个武士前去攻打他。一阵刀光剑影，杀得子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在激烈的搏斗中，一个武士将子路的帽缨砍断，子路立刻想起孔老二“君子死而冠不免”的教诲，赶紧弯腰去拾帽缨。正当子路忙着系帽缨的时候，两个武士一拥而上，结果了子路的性命。这就是“子路循礼丧生”的故事。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孔老二“以礼治军”的腐朽性，而且也可以看出，孔老二及其门徒拼命维护“周礼”，妄图使腐朽没落的奴隶主阶级东山再起的反动性。然而，历史总是无情地嘲弄那些逆潮流而动的反动派。子路为维护“周礼”赤膊上阵，孔老二推行一条反动的军事路线，都挽救不了奴隶制的垂死命运，最终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纷纷起来用暴力手段，打碎奴隶制的国家机器，建立起新的封建制度。为了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新兴地主阶级迫切需要发展军事理论，提高军事技术。在这

种情况下，产生了一些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政治家、军事家，他们推行了一条和儒家根本对立的军事路线。

孙武就是春秋末期一个杰出的法家军事家。他是齐国人，后来做了吴王阖闾的将军。他写的《孙子兵法》十三篇流传至今，是我国军事史上的宝贵遗产。孙武继承了法家先驱管仲的军事思想，明确地提出了“以法治军”的理论，和孔老二的“以礼治军”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孙武认为：“有赏必须也有罚”，对有战功的将士要厚赏，对违反纪律的将士要处刑，情节严重、影响全局的要处死刑。他说：“只有坚持赏罚严明的制度，士兵才能心服，军队才能有战斗力。”孙武演兵的故事，就是他“以法治军”的一个生动事例。

一天，吴王把孙武叫来，对他说：“先生的十三篇兵法我全看过了，讲的很透彻，不知你能否训练一些士兵，让我看一看。”孙武答复说：“可以。”于是，吴王从宫中选出一百八十名宫女，交给孙武训练。孙武把宫女分为两队，任命吴王宠爱的两个妃子为队长，让女兵们拿好武器。孙武将训练的各种要求讲了一遍，便开始下令训练。但是，那些平常在宫中随便惯了的宫女们，虽然身着盔甲，手拿刀枪剑戟，却把训练当做一场儿戏。孙武下达的命令，她们不但不听，反而哈哈大笑起来。孙武严肃地说：“我没有讲清楚，所以军令不熟，纪律不明，这是我的过错。”接着他又三令五申，重新讲解了一遍，再次发令。那些宫女们还是嘻嘻哈哈地不当一回事。孙武见此情景严肃地说：“前次没讲明白，是我的责任。这次，我已把训练要求反复讲解了，你们还这个样子，是明知故犯，这是两个队长管教不严的责任。”说完，他就发出命令处斩两个队长。吴

王正在台上观看，见孙武要杀两个爱姬，赶紧派人求情。孙武理直气壮地说：“我身为大将，责任就是治理军队，这两个人违反军法，就应该按照军法处理，大王的话我不能接受。”说罢，还是命令军士把吴王两个妃子推出去砍了头。然后重新任命了两个队长，继续进行训练。这次，宫女们个个认真，人人在意，丝毫不乱，没有再敢嬉笑的了，训练得整整齐齐。孙武派人向吴王报告说：“兵已练好，请君王下来看看，现在大王就是命令她们去赴汤蹈火，她们也不会胆怯了。”

通过这件事，吴王看到孙武善于用兵，治军有方，就派他去统帅吴国的军队。孙武在军中赏罚分明、精心训练，使吴国的军事力量迅速强大起来。“西破强楚，北威齐晋，显名诸侯。”这都是和孙武执行“以法治军”的路线分不开的。

孙武是“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他以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总结了新兴地主阶级在武装夺权、兼并战争中积累的斗争经验，提出了一套适应当时战争特点的军事思想和战术原则，为新兴地主阶级提供了一条比较完整的军事路线。在战争观上，孙武认为“军事力量的强弱，是一个国家的首要问题，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把军事和政治紧密地结合起来，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用暴力手段夺取政权的政治要求。

孙武反对唯心主义的天命论，用朴素的唯物论思想指导战争。他指出：“要了解敌人的情况，不能靠向鬼神祈祷的方法，也不能用夜晚观察星辰运行的度数去占卜，要从了解情况的人那里去取得。”同时，孙武十分注重调查研究，主张在战争中要掌握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不断地进行分析研究，从而

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孙武的军事理论中，还含有很多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特别注意研究战争中各种矛盾现象，如敌我、主客、众寡、强弱、存亡、攻守、进退、奇正、虚实、动静、胜败等等。并且认为：“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这些对立面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在战略战术方面，孙武提出“兵不厌诈”、“避实而击虚”等灵活多变的作战指导思想。他主张打速决战、歼灭战，明确指出“兵贵胜不贵久”，反对击溃战。他还对用兵原则、军队作风、将帅与士兵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

有的外国人称《孙子兵法》是“东方兵学的始祖”，“世界古代第一兵书”。这说明孙武在军事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反映了处于革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武装夺权的进步要求，对于批判孔老二腐朽反动的军事思想，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孙武毕竟是地主阶级的军事理论家，他不可避免地受其阶级及时代的限制。对于孙武及其兵法，我们应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做到古为今用。

二

行新法商鞅以战去战 开倒车孟轲欲罢三军

战国时期，我国历史上的社会大变革进一步深入了。新兴地主阶级依赖奴隶起义和劳动群众反抗的力量，在各诸侯国相继夺取政权。没落奴隶主贵族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千方百计地拼命挣扎，阴谋复辟。在夺权与反夺权，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中，儒法两条军事路线的对立更尖锐了。一些法家军事家在新兴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阶级的斗争中，起了积极的作用。比如，秦孝公用商鞅，达到了富国强兵；楚悼王用吴起，战胜了敌国；齐威王、宣王用孙膑和田忌，成了各诸侯国的盟主。特别是商鞅的“以战去战”的军事思想，所起的进步作用，更为明显。

商鞅是战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也是杰出的军事家。他原来是卫国人，因为喜欢李悝的法家学说，就到了魏国。但在魏国没有得到重用。后来听说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他就带着李悝著的《法经》，满怀变革社会的壮志，到了秦国。

秦国处地偏僻，一直比较贫弱，甚至没有参加诸侯“会盟”的资格。公元前三六二年，秦孝公继位后，决心“变法以治”，改变秦国的落后面貌。商鞅入秦，恰好适应了秦孝公所代表

的新兴地主阶级“富国强兵”的愿望。公元前三五六年，秦孝公任商鞅为左庶长，掌握军政大权，开始实行变法。

商鞅认为，要改变秦国兵弱国穷的状况，只有“通过发展农业生产、奖励军功的方法，国家才能富强，国君才能有尊严。”因此，商鞅变法的第一条就是奖励军功。他明文规定：“官职的大小和爵位的高低，要以战场杀敌立功为标准。英勇善战、屡立战功者，论功行赏。有特殊贡献者破格提拔，给予优厚的待遇；没有军功者，不论是皇亲国戚，还是官僚贵族，也要削其爵位，减其俸禄。”为了使这项措施得以贯彻执行，商鞅还制定了一整套奖励军功的标准和方法，如一个普通士兵，在战斗中杀死敌人一个领兵官，赏军爵一级，或给五十石的俸禄。商鞅把军爵定为二十级，一般的军功赏予“公士”爵位，军功显耀者甚至可以封“关内侯”、“彻侯”。这样一来，奴隶制那一套世卿世禄制度、奴隶主旧贵族的政治特权就被摧毁了。

商鞅变法的第二条是奖励发展农业生产。商鞅规定：“努力从事耕种和纺织，多生产粮食和布帛的，可以免除徭役赋税。弃农经商或因懒惰而贫困者，连老婆孩子一起收入官府做奴婢。”为适应封建经济的发展，商鞅宣布废除奴隶制的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和买卖自由。

秦国土地辽阔，可供开垦的荒地很多。为了充分挖掘潜力，发展农业生产，商鞅对从其它诸侯国逃到秦国的奴隶和农民，一律分给土地和房屋，让他们在秦国安心从事农业生产。在国内，凡是一户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仍不分家的，则加倍征收赋税。这些措施的贯彻执行，使奴隶主旧贵族的经济特权，日益受到打击削弱，秦国农业生产能力日益提高，新生的封建

经济蓬勃发展。

商鞅变法的第三条是实行兵农合一的政策。他认为：“要使国家兴盛起来，必须使国家专一于农战。而要改变受人欺侮的状态，必须实行兵农合一的政策，使耕战结合在一起，建设一支强大的、常备不懈的武装力量。”

商鞅主张人人都要能耕能战，人人都要当兵。平时从事农业生产，战时奋勇杀敌，协同作战。他把全民组成三军，“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老弱者为一军”，一旦发生战事，全民动员，全民参战。三军各尽所能，明确分工：壮男一军的任务是摆好阵势，待敌而战；壮女一军的任务是坚守阵地，修筑工事，埋设障碍；男女老弱一军，负责后方生产及放牧，做好后勤供应工作。这样，秦国不仅能在三百万人口中，保持近六十万的常备军，而且通过“兵农合一”政策，使秦国的军事力量有了雄厚的基础。

商鞅实行变法目的在于加强新兴地主阶级的力量，使秦国“富国强兵”。然后，以新兴地主阶级的进步的统一战争去消灭反动奴隶主阶级分裂割据的战争，用新兴地主阶级专政代替没落奴隶主阶级专政。商鞅明确地指出：“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由于商鞅的主张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要求，“新法”实行以后，使秦国出现了“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的局面。不久，秦国由一个落后诸侯国，变成一个“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的新兴封建强国。商鞅奖励耕战、富国强兵的法家思想，在实践中取得了胜利。

商鞅从“以战去战”的思想出发，第一次提出了用战争统

一全国的进步主张。在商鞅倡导下，秦国进行了一系列谋求统一全国的战争。公元前三五四年，趁魏、赵交战之机，秦国发兵攻打魏国，进占魏地少梁；公元前三五二年，商鞅亲自率兵向魏国西部进军，迫使当时头等强国魏于公元前三五〇年与秦讲和，取得了变法以来军事上的初步胜利。

公元前三四一年，齐国新兴地主阶级的军事家孙膑，打败了魏军，俘虏了太子申和魏将庞涓。消息传到秦国，商鞅认为这是东进击魏，给统一战争打下基础的好机会。于是，商鞅进见秦孝公，指出：“如果出兵成功，可以迫使魏国把都城从安邑迁走，这样秦国就可以夺取黄河以西的土地，占据黄河及函谷关天险。便于今后出兵逐步消灭各国，这是完成统一大业千载难逢的良机！”商鞅深刻的分析，精辟的见解，使孝公十分高兴，立即派他率兵伐魏。

商鞅率领五万精兵开赴河西。魏国派公子卯领兵迎战，两军对峙。商鞅设计，派人送信给公子卯，假意请他前来谈判退兵。公子卯信以为真，仅带少量随从到秦军营。正饮酒时，商鞅示意部下，埋伏好的兵将一拥而上，生擒了公子卯。之后，商鞅又派人假扮公子卯，骗开魏军城门，奇兵直入，大败魏军。秦军一鼓作气，连战连捷。魏军连连失利，国内空虚，只好把河西之地交给秦国。

河西大捷使秦国夺回了被魏国占据多年的战略要地河西郡。为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新兴地主阶级胜利之日，就是奴隶主阶级灭亡之时。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儒家，极力反对革命的进步战争。他们对商鞅的耕战思想极端仇视，咒骂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